



Tsinghua University

文池 主编

在 清 華 听 讲 座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池 主编

在清华听讲座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清华听讲座(第一辑)/文池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7

ISBN 7-5004-3072-8

I. 在… II. 文…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4200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叁陌工作室
技术编辑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府，清华历史上群英荟萃，大师云集。梁启超先生曾在清华的演讲中说道：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梁先生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了清华的校训。

在回忆旧清华的人文盛况时，现在的学生喜欢用“长剑如花，白衣胜雪”来形容，清华“国学研究院”及“清华学派”开一时之风气，辉煌一时，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学术薪火相传，经90年风雨沧桑，清华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且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清华人秉承“中西贯通，文理兼备，古今融汇”的治学理念，严谨，勤奋，务实，使清华历久而常新。

今日之清华，人文日新，学术氛围日浓。清华名师王国维先生所言“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气象在清华园处处可见，《在清华听讲座》亦可视为当下清华人文的一个缩影。本书原是清华中外文化综合班所邀诸多专家，学者的讲座记录，未正式出版之前，早已被学生们装订成册，在清华园广为传阅。每一个讲座，都是凝聚着前辈智慧的学术精品。对于那些正在路上探索着的，积极向上的读者来说，能够读到本书，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编者

目 录

1 / 20 世纪中国史学	张岂之
23 / 美国的忧郁	赵一凡
51 / 谈中学与西学	何兆武
77 / 从中国古代诗词翻译谈中西文化精神比较	许渊冲
95 / 美与物理学	杨振宁
111 / 文学与文学研究	蓝棣之
141 / 谈谈比较文字学	周有光
163 / 清儒治学	宋玉珂
179 / 中国古代书籍版本与装帧	马春怀
191 / 汉语音韵学——传统与创新	聂鸿音
213 / 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	孙宏开
247 / 马相伯的语言观和语法观	姚小平

张岂之

20 世纪中国史学

张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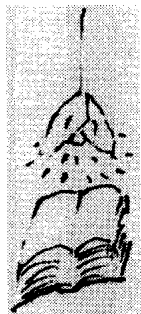
1927年11月生，江苏南通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3年开始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并研究大学中的人文教育问题。现任清华大学、西北大学双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自著并主编有：《儒学·理学·实学·新学》、《近代伦理思想变迁》、《中华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等。并主编《华夏文化》杂志。

这么大的题目，从何下手？100 年的中国史学，那么多的书，怎么做法？我想做法有两点：第一，我们这个班的培养目标是造就中西融会的高层次的研究人才，那么就需要在“中西融会”这四个字上做文章，看看我们的前辈在中西融会上究竟是怎么做的。我想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给大家剖析一下，大家印象就很深了。第二，选取代表。20 世纪史学家这么多，时间那么长，该如何选取代表？我认为，这些代表应该和我们清华有一定的历史联系，这样大家听起来就会很有兴趣。这一个世纪中国有几位史学大师，曾经就在我们清华园里从事史学耕耘，对历史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进入 21 世纪，很自然的，我们新一代应该把他们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下面我把这两点融会在一起，讲一讲，我想大家会有收获的。

无论写文章也好，讲演也好，发言也好，总有一个从哪儿出发、抓住什么问题。所以我就选取了四位大师，其中三位和我们清华有密切联系。第一位，梁启超。不写了，不需要板书。如果同学不会写这个名字，请自己下去查并写若干遍。第二位，王国维，也不需要板书。第三位，陈寅恪。陈先生自己讲：“我的名字叫陈寅恪（què）。 ”第四位，大家熟知的、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老前辈郭沫若先生。

现在开始讲第一个题目，是关于梁先生的，就叫“新史学口号的历史意义”。我们这个世纪，20 世纪，很快就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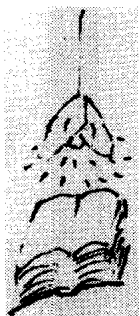


去了。在我们这个世纪开始揭开帷幕的时候，梁启超（1873—1929年）在1902年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名叫《新史学》。呼吁建立新史学。在这篇长文中，梁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史学有些缺点，说不要把这些缺点再带到20世纪。有哪些缺点呢？他认为有四个缺点。我不引他的原话，用现代汉语。第一个缺点，他讲，我们传统的史学以朝廷得失兴衰为叙述中心，“朝廷”的观念很深。但是“国家”的观念很淡漠，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这个需要改。第二个缺点呢，我们读了过去一些史书以后，只知道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都是个人。我们不知道有群体，群体作用在我们过去历史中重视得很不够。第三个缺点，我们读了过去的史书以后，对过去的事情很了解，但对今天的事情不怎么理解；对过去的事情了解很多，对未来的事情却缺乏预测。第四个缺点，看了过去的史书以后，印象是每件事情描述得很清楚，过程、最后结果如何，清清楚楚。为什么事情演变的结果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原因何在？似乎没有规律可循（当时“规律”这个词还没有，只用“法则”，或者叫“原理”，或者叫“公理”——借用几何学上的“公理”，就和我们今天讲的“规律”的用法是一样的）。正因为过去的史学有这四个方面的缺点，所以梁先生在1902年这个长篇文章里就提出：要改写历史，要创新。如何改写呢？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有一个提要，这里我们就不说了。和他同时的另一个大师，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先生也认为中国历史应该改写，对如何改写也有一个方案。我想事实不需要再多举，听了这些以后同学们就会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拉开帷幕的时候，一些大家就提出要建立新史学的体系，原因何在？早不提，晚不提，就在1902年，还在清朝统治之下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思考。我在此就把问题提出来，请同学们思考思考。我提一个

线索：第一，看 20 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文学、历史、哲学等等——不能离开 20 世纪中国整个的大环境。20 世纪的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民族独立，摆脱列强的侵略压迫而独立；二是国家复兴，要建成一个富强的、繁荣的、民主的国家。同学们将要学习的其他一些文史哲课程都和这个总的课题联系在一起，这里不需要多讲。第二，从 20 世纪开始，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一步一步密切起来。在西方某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人文科学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什么新时代呢？人文科学觉醒的时代。怎么样觉醒呢？一个方面，要研究整理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以便将好的东西继承下来，不好的东西抛弃掉。就是说优秀的传统文化要过渡到现代，实现“现代转换”——这个任务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大家还要继续做。另一个方面，要学习外国文化，特别是要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文化，把世界文明成果有选择地引进到中国来，并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文史哲和其他人文科学的觉醒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谈到中国的 20 世纪，从人文科学来讲，是个伟大的世纪。当然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的先行者虽然有很多贡献，但毕竟还没有完成。所以 21 世纪，大家在前辈人努力的基础上要继续开拓。我想，不早不晚提出“新史学”口号，主要原因就在这里。理解 20 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不能离开 20 世纪我们中国的总课题，不可能脱离时代，因为正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潮流决定了 20 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总特点。

创造“新史学”的口号提出来以后，我们前辈大师不光是停留在提口号上，还具体地要作出榜样，亲自实践，进行刻苦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梁先生就认为，要建立新史学，必须了解世界。不能光守着中国这一角，要了解整个的世界。首先从哪儿下手呢？我们前人走的路也是很曲折的；梁先生以为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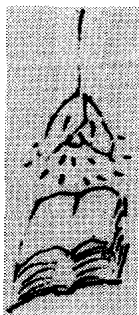
解世界地理，空间要了解清楚。同学们将来查梁先生《饮冰室合集》，会发现里头有一批地理学方面的文章。例如《亚洲地理大势论》，就亚洲地理大的形势，他写了文章。又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欧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包括多少国家，这些国家里头风土人情如何、政治制度如何、它的科学发展状况如何等等，写起来不容易，因为那些材料很分散，要集中起来。还写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化”）。这些文章中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光了解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够不够？不够。有一个重要问题引起梁先生探索的极大的兴趣。哪一个问题呢？从19世纪起我们中国很多人就研究的这个问题：西方近代有些国家国力强大，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的原因。19世纪有一些看问题比较敏锐的人，提出一个答案，认为西方有些国家是法制国家，有上议院、下议院或参议院、众议院，上下都沟通合作，所以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畅通。但梁先生的看法要比这些人更深入。同学们，你们说，19世纪欧洲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梁先生的回答是：因为欧洲有了新的哲学体系，新的方法论。根据这样的看法，梁先生就写了几篇大文章。例如有一篇文章叫做《霍布士学案》。霍布士（1588—1679年）是谁？英国的哲学家。还有一篇文章，叫《斯片挪莎学案》。斯片挪莎（1631—1677年）是哪个国家的？荷兰人，17世纪荷兰的哲学家。还有一篇文章大家都很熟悉的，《培根学说》。培根是哪一个国家的？培根（1561—1626年）是16—17世纪英国的大哲学家。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新工具》早就被翻成中文了。“新工具”就是新的哲学方法、新的研究方法。培根提倡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方法？科学的归纳法。他在《新工具》里对科学的归纳法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表述，要用新的科学归纳法去反对经院哲学教条化。他讲不要以为书上写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不要以

为所谓先知所讲的每句话都是对的，我要依靠我的科学的归纳法对所有论断重新审查。梁先生还写了《笛卡儿学说》。笛卡儿（1596—1650年）是哪个国家的哲学家？法国的。他最著名的著作叫《第一哲学沉思集》，里面提出一个有名的命题：

“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我要用我的理性去分析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用我的理性把现有的结论都重新加以审查，看有没有根据。他把理性的地位提到一定的高度。笛卡儿在方法论上使用了几何学的演绎方法，他使得演绎法更趋完整，更加科学化。通过对近代哲学的研究，梁先生写了一篇大文章，题目叫做《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哪两大家呢？培根一家，笛卡儿一家。在这篇文章里，梁先生发前人之所未发，创造性地提出欧洲18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受两个哲学家的影响，所以要给培根和笛卡儿一个桂冠——近代文明的初祖。照这个说法，中国人的思维不变、头脑不近代化，要造成科学的发达是不可能的。100年过去了，梁先生的话，我们100年后再来看，仍觉得发人深思。这100年间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很多中国革命志士前赴后继，但是我们在教育方面太注意实用。西方自然科学的基础及其哲学的根源，我们研究得不够，了解得不够。这个缺陷到21世纪需要弥补，这个工作应该和我们的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的战略统一起来。梁先生贡献很多，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要用新的方法来整理传统文化，梁先生就到了清华国学院，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关于梁先生我就讲这么一些。我就用这么一点材料，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初梁先生分析欧洲有些先进国家何以发展迅速，认识到原因是他们有了新的世界观、新的哲学。这个很有创造性，为中西融会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结论同学们同不同意？我想同学们是会同意的。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从王国维的学术成就看中西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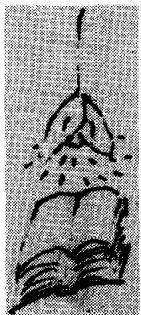




会”。王国维和我们清华过去的国学院关系很密切，他的生卒年份是 1877—1927 年。王国维的生平我简略地介绍一下。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字静安，晚号观堂。王先生的著作有《观堂别集》、《观堂集林》。他早年 to 日本留学，学习哲学，对德国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很有修养。那时真正钻进去的人不多，现在看 20 世纪叔本华和尼采的研究，最有修养的还是王国维。早年他研究哲学，后来又转而研究文学。王先生研究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在 20 世纪学术史上不朽的著作，大家都要看的。一本就叫做《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字数不多，一万多字，提出了关于中国古典诗词里面的“境界说”。这是大的创造、大的发展！王先生的《人间词话》发表以后，人们再研究中国古典诗词，谈怎么欣赏、怎么理解，觉得还是没有王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古典诗词境界说说得深入。这是巨大的贡献！还有一本著作叫《宋元戏曲考》。这是研究宋元戏曲史的一本名著，很有分量。还有一本著作叫《红楼梦评论》。20 世纪中国“红学”风行一时，用叔本华（1788—1860 年）的观点来解释《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以王国维先生的这本书最有代表性。1925 年清华国学院成立。清华国学院有什么背景呢？当时清华的校长曹云祥是个外交家，对西方的文化还有一定的了解，他觉得清华光有留美预备部是不够的。因为欧美有些大学都有研究生部，所以他就找到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的、从美国回来的、人人皆知的一位博士——胡适。当时胡适名扬天下，别人写文章，都以这句话为荣：“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可见和胡适作朋友，无上荣耀。曹云祥校长就对胡适博士提出：清华要搞研究生部，你在美国留学多年，给我们提个方案。胡适就讲：能不能先搞一个国学院，仿照宋代的书院制度。书院制度很有意思，将来同学们学历史会知道，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开一个书院，由著名的导师带一批学生共同研究，

平等讨论。如果外面还有哪些学者和这位导师思想不和、有另外的学术观点的，就请到一块儿在书院里头辩论。辩论来辩论去，学术进展了，还不影响友谊。书院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胡适就以此为参照，又综合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部的情况提出了一个方案：国学研究院不设院长，光设一个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请的是吴宓先生。他的中外文化修养很深，人也很忠厚，能够团结学者。导师由办公室主任来请。梁先生已经是导师了，以后又请了王国维。根据吴宓先生日记——将来你们去中文系的资料室去看看吴宓写的日记——1925年某一天，吴宓拿着曹云祥校长的信到定安门王国维的家去聘请他。王国维很注意礼节，吴宓先生首先在王国维家的厅堂里等候，仆人通报；然后王国维从内室姗姗而出。吴宓双手将曹云祥校长的信递给王国维，不是光递，而且紧接着深深地鞠躬。王国维接受了聘请，就到了清华。他对中学和西学究竟怎么看呢？他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用八个字就理论化了，对20世纪人文学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这几句话在哪一篇文章里头写着呢？这篇文章名字就叫做《国学丛刊序》（见《观堂别集》）。“国学”，就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丛刊》是当时学术界同仁办的一份杂志，王序认为中学和西学是下面的关系：“盛则俱盛”，要兴盛呢一块儿兴盛；“衰则俱衰”，要衰败下来一块儿衰败。八个字。中国的国学要兴盛起来，离不开西学；而西学要介绍到中国来，被很多人接受，要融会中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这八个字，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中学离不开西学，西学也离不开中学。下面几句话就发挥了：“风气既开”（而不是闭关自守了），“互相推助”（学术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讲今日之学”（我们要讲今天的学问），“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有一种人，对西学毫不了解，对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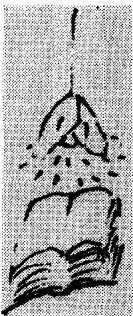




方文化毫不了解，却能把中学传统文化搞好。没见过！）讲得很有分量。“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也没有这种情况：对中国传统文化毫不了解，就能真正把西学学好）。因此结论只能是：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同学们，后来是不是“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呢？那位同学摇头是对的，我们有共鸣了。不是的。大家看看，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培养人才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学外文的同学们，外国文化也许不错。但是你问他有关中国文化知识，诸如孔子是怎么回事，《庄子》你读过没有？回答可能是没有。不了解中学！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和西方国家接触，封闭起来，对西方的东西不了解。这种情况下研究我们中国的东西也是不行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情况逐渐好转了。我们今天再读王国维写的话“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同学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很有见解的吧。而且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谈大学怎么办，课程怎么安排，大家看看：“翌日”（将来），“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者”（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起来的人），“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必定在这些人。哪些人呢？精通世界的学术的人）。讲得好哇，有眼光。“而不在一孔之陋儒”（一孔之见，就懂得那么一点芝麻大的东西，陋儒，算不上大儒，算不上大学者）。这给我们一个鞭策，将来你们在座的同学就是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者，你们一定要精通世界学术，决不能够陷于一孔之见。那么西学和中学比较起来究竟怎么样？王国维有一篇文章，叫做《论新学语之输入》。什么叫“新学语”？新的科学名词介绍到中国来。科学名词当时就叫做“学语”。他明确讲，西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西学灵魂不在那些应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哲学和方法论，有的地方称之为智慧之学。那么西学的哲学和方法论的长处在哪里呢？“长于抽象而精于

分类”。西方哲学抽象，要找到世界的普遍原理，在纷繁复杂的现象后头找到基础是什么，要去追求世界的普遍性。抽象，把其他具体的东西舍去，而精于分类。西方那个方法论分类非常科学，分类很细，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都运用综合及分析二法，当时就是这样理解，认为西方方法长于综合和分析。现在我们理解又加深了，仍觉得当时王国维的看法很精辟。那我们中国的学问长处在哪里呢？王先生坦率地说，“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我们中国学问的长处宁可说在于实践，在行动方面）。下面一句也不错，“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在理论方面不做深究，对科学的抽象没有多大兴趣，得到一些具体的知识就满足了）。所以研究中学必须要研究西学，要研究西学里头的哲学和方法论。王国维的看法很深刻，他的这个思想已超越于他的时代，有前瞻性，另外也是他自己研究实践的一个很好的现身说法。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以后，有学生问他，我们要学历史，应该打下什么基础？他开了一个书单，后来培养出了我们20世纪一批史学上的带头人。书单上有13门学问都必须具备。一类，中国史的知识；二类，东洋史的知识，实际就指亚洲史；第三类，西洋史的知识；第四类，哲学概论的知识；第五类，历史哲学的知识；第六类，年代学；第七类，比较语言学的知识，通过语言的差异研究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所以20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有些学者到欧洲去专门学比较语言学；另外还要学习比较神话学；还要学社会学；还要学人类学，人类学包含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考古学；还要学教育学；还要学外国文学等等方面的知识（《静安文集续编》）。根据记载，这个书单一出，国学院一些学生怕得不得了。这怎么办啊？王国维说，慢慢读嘛。当你感到必须具有这些宽阔基础的时候，你就不以为难了。果然如此！





那么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王先生的创造性究竟在哪里呢？如果这个问题要展开说明，估计要有五六个小时才能讲清楚。但我在 10 分钟之内讲，只举一个例子：王先生很强调要用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科学之新发现由于新材料之发现。”特别是研究历史和人文科学，你没有新材料那怎么办呢？这和理工科是一样的。理工科必须要通过实验，有新的事实和数字，而人文学科要有新发现、新材料。到 19 世纪末有新东西出土啦，什么东西呢？甲骨文——商代的文字。为什么叫甲骨文呢？因为这些文字刻在兽骨上，或者刻在龟甲上。甲骨文最早在殷墟，即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发现的。较早把它收集起来加以研究的是对清王室忠心耿耿的一位叫罗振玉的人。王国维一看到甲骨文，也投入研究，很快就掌握了一些。但甲骨文研究不能光停留在古文字学这个范围之内。研究它，还要把它作为史料去用，那是研究商代历史的史料。所以他在甲骨文的研究基础上，在国学研究院开了个课，叫“古史新证”，讲古代历史的新证据。这里讲的“古史”不是指整个中国古代史，而是指商代的历史。“新证”，新的证据，靠商代的甲骨文字去研究商代历史。首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里头开，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有关具体研究，我举一个例子：司马迁是一个大学者，西汉时期人，他的《史记》号称中国文化的明珠，光辉是永远抹杀不了的。在《史记》中的《殷本纪》记载了商王的世系。王国维就用甲骨文和《史记》里头《殷本纪》的文字对证，这功夫就很细，对证结果基本上差不多，也有疏漏，要根据甲骨文和其他的一些材料加以匡正。他写了两篇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这就是贡献。别人没有做过的首先做，而且以确凿无疑的根据将得出的结论摆在学术界面前，并将“古史新证”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王先生讲的方法论是什么